

新选新注



唐宋八大家书系

新选新注唐宋八大家书系

主编：王运熙 选注：霍松林 霍有明

韩愈卷

中国工人出版社



新选新注·唐宋八大家书系

韩愈卷

霍松林

霍有明

选注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选新注·唐宋八大家书系: 韩愈卷/霍松林, 霍有明选注.-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7. 5

ISBN 7-5008-1880-7

I. 新… II. ①霍…②霍… III. ①古典散文-中国-唐代-选集②古典散文-中国-两宋时代-选集 IV. I 264.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4335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经 版	刷 销 次 北京兴泉印刷厂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字 印 印 定	本 数 张 数 价 850×1168 毫米 1/32 230 千字 9.5 1~5000 册 14.00 元

总序

王运熙

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历史上，唐宋散文，特别是以韩柳欧苏为代表的八大家散文，无可辩驳地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们承秦汉古文的朴素自然而济以条畅，弃六朝骈体之繁缛雕琢而有所酌取，形成一种很适合于表情达意的新文体，这种文体长期为后世所颂扬，并被视为散文创作的典范。

最先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八人合在一起，并予以大力推崇的是明初人朱右。他以八人文备三才之道，适万汇之宜，彰善制恶，褒是去非，可以为后世法式，故汇编其作，成《八先生文集》。嘉靖、隆庆年间，唐顺之竭力推崇唐宋散文，选先秦至宋文章为《文编》，于这一时期也标举韩柳欧苏等八家，并用以与李梦阳、何景明等秦汉古文派抗衡。稍后有茅坤服膺唐氏之论，遂专取韩柳等人文编成一集，径题为《唐宋八大家文钞》。由于唐顺之等唐宋派的提倡，《文钞》选录也较得当，其评语足为初学门径，流传颇广，“八大家”或“唐宋八大家”之名由此广泛传扬，他们的文章也因此家弦户诵，成为人们学习模仿的对象。

中国的散文，在先秦西汉时期，语言一般朴素自然。至东汉，

崇尚骈偶的骈文抬头。此后魏晋南北朝隋代，骈文日趋发展昌盛，除重骈偶外，还讲求辞藻、声律、用典等语言美。在这段时期内，骈文在文坛占据了主导地位。此间骈文也产生过不少长于抒情写景、语言美丽的佳作，但因过分重视形式，束缚过大，影响了散文抒情达意的功能。当时虽有少数人起来批评和反对骈文，但均未奏效。至唐代，社会上流行的文体仍为骈文。唐代前中期，出现了若干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的散文家，如陈子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元结等，但因才力不足，认识上也有偏差，因而成就均不很突出。直到韩愈、柳宗元出来，才从根本上动摇了骈文的统治地位。

韩愈少从伯兄韩会游，为梁肃及萧颖士子荐所赏识，与李华从子李观结为至友。前辈的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无疑对他产生过影响。在此后长达数十年的文学实践中，他用很大力气来提倡古文。基于正在走向上升的庶族知识分子特有的道德热情、社会理想和政治视野，他明确提出修辞明道的主张，认为作文正需师古，词必已出。词不管难易，唯求其是。文章必须是内在志气充沛的表现，所谓气盛而言宜。与此相联系，他还认为大凡不得其平而鸣的作品，尤有真实情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送孟东野序》），提出“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之说。由于他行文能自树立，不但立意深刻，议论精到，且能兼采先秦汉代各家之长，自铸新词，风格浑灏宏肆而不失多样化，因而在散文创作上获得巨大成就。韩愈广事交游和招收弟子，传授古文，当时跟他写作古文的士子颇多，古文创作在当时形成一种相当大的潮流。

在此期间，柳宗元的功绩也十分巨大。与韩愈一样，柳宗元也重视文章的明道作用，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基于进步的哲学

观、社会观，他还提出辅时及物为道之说。他重视作家的修养，重视认真揣摩和学习古人文章，于儒家经书和西汉古文外，兼取诸子散文和《楚辞》，如此“有乎内而饰乎外”（《送豆卢膺秀才南游序》），临文以敬，旁推交通，使他的散文别具一种隽永的魅力。如果说韩文气势宏肆，不可控驭，他则峻洁幽深，滋味醇厚。又由于他与韩愈一样，也与一时古文家如刘禹锡、吕温、韩晔、吴武陵等人相往还，他虽谦称才能勇气不如韩愈，故不为人师，实际上还是努力奖掖后进，当时后学之士追随他学习的颇多，经他指点，为文都有法度。所以，他之成为古文运动的又一领袖是十分自然的。他与韩愈虽在政治主张等诸方面不尽相同，但在为人、为学上彼此钦敬，各自对对方的古文成就有很高的评价。由于领袖人物卓有成效的创作实践和明确的理论主张，有一批追随者积极响应，一场以儒学为旗帜，以复古为号召，以文体改革为中心，同时在深层意识中有维护唐王朝统治为目的的古文运动，遂演成相当巨大的声势，韩、柳两家散文也由此被人奉为古文的典范。

中晚唐时代，在韩愈影响下，出现了李翱、皇甫湜、孙樵等古文家。但他们的成就均不及韩柳，有的更是一味求奇，使文风陷入晦涩而缺乏号召力。晚唐五代以迄宋初，仍是骈文势力强大。在宋初文坛占主要地位的是以杨亿为首的西崑派，其诗文均崇尚骈偶，文辞华艳。宋代前期，柳开、王禹偁、石介等人出来反对浮华文风，均未能取得明显效果。

直到欧阳修出来，不但摒弃“西崑体”，反对六朝以迄唐代的崇尚骈俪声律之文体，还注意克服倡言古文者好为怪僻之语的“太学体”，取韩文为范式而兼采骈文，以为“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同时，他承韩柳重道之说，以为道胜文至，但又极重视散文创作自身的文章特点，不抹杀古

文的独立地位。由于他凭藉贡举的优势地位，作有倾向性的提倡，使浮艳文体一时失去市场，以怪僻知名者也黜落殆尽。他还以独到的眼光，敏锐地发现如苏轼父子这样的人才。经过欧阳修的提倡和主持风气，文风变而趋于复古，而这复古与韩愈一样，是以复古为革新。

当然，苏轼父子及王安石、曾巩等人的理论响应，特别是他们的创作实践，也是促成宋代散文革新成功的重要因素。正是在欧阳修的指导下，在上述诸大家的积极响应和配合下，新一轮的古文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地展开。经由宋代六家大力有效的提倡和创作实践，特别是欧阳修、苏轼突出的创作实践，一种新的古文观得以确立。一方面，它继续崇信韩愈所标举的儒家之道，同时注意赋予这种道以更广泛的现实内容，使之“周万事之理”，“适天下之用”（曾巩《南齐书目录序》）；另一方面，更重视古文独立品格的实现，既要求它事信而载大，又要求它有自然流畅的审美品位。在这种古文观指导下，诸如欧阳修的条畅绵邈，苏轼的雄肆通脱，苏洵的驰骤博辩，还有曾巩的平正婉雅，王安石的简洁峭拔，苏辙的冲和澹泊，皆各逞其姿。他们以这种自然平实又深切著明的新文体来言事论政，谈兵议学，论叙山水，宣泄性情，既不完全排斥骈偶藻绘，但又不苛求属对精切缜密；既不排除拒详赡博达，但又截然无取繁富冗长，不明体要。并且，比之韩柳等唐代古文家，他们的散文指事析理，更求洞彻，写景抒情，每趋清畅。倘若说，唐人作文更重字句的锤炼和气势的营建，他们则更多地用平易流畅的语言，从容不迫的节奏和体调，造成一种清新朗练的风格。在此过程中，他们对虚实字的研究和运用，对创作技巧、手法的探索和总结，对古文本身体式的创设和拓展，都较之前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古文在他们手中，确实达到了一个新

的阶段。

唐宋八大家在散文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如上所述是巨大的。无论是从散文的理论建设来说，还是从实践积累来说，它都给后人提供了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为后代散文创作树立了一个很高的标准。韩、柳古文理论和创作是欧阳修等人再兴古文运动的精神榜样自不必说，即此八家散文对后世历代文人的影响而言，也是十分深远的。元明清时代，虽有一些人无取乃至排斥唐宋古文，以秦汉文为至上的样板；还有一些人则更以复兴骈文为职志，排斥一切散体古文，称“自唐宋韩、苏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为八代之衰而矫之，于是昭明所不选者反皆为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经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谓文者鲜矣”（阮元《书昭明太子文选后》），但在明代自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到“公安派”、“竟陵派”作者，大抵都是沿韩柳及欧苏古文一派而取得实绩的。清中叶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以及后起的梅曾亮、恽敬、曾国藩等人，也是从八大家古文中得到无穷的滋养，其沾溉来叶，垂范后昆，厥功甚伟。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编选了这一套唐宋八大家书系。所选篇什大抵录自各家别集，大多数为当日及后世有定评者。它们既体现了八家古文各自不同的风格特征，又关涉唐宋两代整个散文创作的发展关键和主体。限于篇幅，尚有一些佳作未能悉数选入，只有请读者原谅了。

前言

霍松林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昌黎是他的郡望，故自称“昌黎韩愈”，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故又称“韩吏部”。谥“文”，故亦称“韩文公”。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

“安史之乱”平定的第五年，韩愈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小官僚家庭。三岁时父母相继病逝，由长兄韩会、长嫂郑氏抚养。七岁，随长兄移居长安。十岁，长兄由起居舍人贬为岭南韶州(今广东韶关市西南)刺史，随兄移居韶州。十二岁，长兄病逝，随长嫂护丧归葬河阳。十四岁，中原动乱，随长嫂避居宣城。十九岁，自宣城赴长安，准备参加进士科考试。社会的动荡，家庭的多难，长兄的教育，孤苦的身世，颠沛流离的生活，激发了他刻苦学习、积极进取的意志。七岁启蒙读书，日诵数千百言，十三岁已能作文赋诗，初有才名。从古文家梁肃、独孤及学习，究心古训，关注现实。自称“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岳阳楼别窦司直》)；“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邢尚书书》)。他渴望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实现他的政治理想。然而虽然经过充分的准备，却自贞元五年至七年(789—

791), 三应进士试不第; 贞元八年四应进士试, 才被录取, 名列第十四。同榜登第者李观、欧阳詹、崔群、李绛等都是天下“孤隼伟杰”之士, 故被誉为“龙虎榜”。唐朝的制度, 进士科考试是由礼部主持的, 中进士后还得参加吏部主持的释褐考试, 及第后才能入仕。自贞元九年至十一年(793—795), 韩愈三应吏部博学宏辞试皆落第。他求仕心切, 于贞元十一年正月至三月三上宰相书申述抱负、希望提拔, 却如石沉大海。

那么, 是不是韩愈的诗文不佳, 才屡遭失败呢? 我们且看韩愈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在贞元十一年三上宰相书不报之后回到河南所写的《答崔立之书》中说:

及来京师, 见有举进士者, 人多贵之, 仆诚乐之, 就求其术, 或出礼部所试赋、诗、策等以相示, 仆以为可无学而能, 因诣州县求举, 有司者好恶出于其心, 四举而后有成, 亦未即得仕; 闻吏部有以博学宏辞选者, 人尤谓之才, 且得美仕, 就求其术, 或出所试文章, 亦礼部之类, 私怪其故, 然犹乐其名, 因又诣州府求举。凡二试于吏部, 一既得之, 而又黜于中书。虽不得仕, 人或谓之能焉。退自取所试读之, 乃类于俳优者之辞, 颇怩怩而心不宁者数月。……夫所谓博学者, 岂今之所谓者乎? 夫所谓宏辞者, 岂今之所谓者乎? 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 必知其怀惭乃不自进而已耳; 设使与夫今之善进取者竞于蒙昧之中, 仆必知其辱焉。

这就是说, 不管是进士科还是博学宏辞科, 倘要登第, 都必须“善进取”、善于迎合主司者心之所好。他认为: 这样的考试, 如果屈原、孟子、司马迁等来参加, 也必然落第受辱。他把自己

应试被选中的文章找出来读，“乃类于俳優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正因为有这样一番痛苦的经历，韩愈才更加认识到诗文革新的必要性，决心开展以复古为革新的古文运动了。

贞元十二年至十五年（796—799），韩愈在汴州刺史董晋幕任推官，广交文学名流，倡导古文运动。董晋逝世，转入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幕任推官。十八年（802）春，赴长安任国子博士。从贞元十九年三十六岁至长庆四年（824）五十七岁病卒，是韩愈政治、文学活动的重要时期。十九年初任监察御史，即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徭役赋税，指斥朝廷弊政，被贬为阳山（今属广东）令。元和元年（806）获赦回京，任国子博士。改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历官至右庶子。因先后与宦官、权要相对抗，仕宦始终不得意。这期间，他倡导的古文运动已逐渐扩大影响。元和十年（815）上《论淮西事宜状》，力主讨伐淮西吴元济，十二年（817）七月，以行军司马身份，随裴度平淮西叛乱，贯彻了他削平藩镇割据、加强中央集权的一贯主张。淮西平定，因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宪宗遣内官往凤翔迎佛骨入大内供奉，王公士庶争相膜拜，百姓且有烧顶灼臂、破产事佛者，韩愈奋不顾身，上表力谏。宪宗大怒，拟处死刑，经裴度等营救，贬为潮州刺史。次年回京，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长庆二年（822）二月，镇州王廷凑叛乱，他奉命宣抚；成功而还，转任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等要职。这一阶段，政治上比较顺利，但不久就因病逝世了。

韩愈一生，在政治、哲学、文学等方面都有建树，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其文学成就尤为突出：诗歌力大思雄、瑰奇壮伟，自开宗派；散文气盛言宜，纵横开合，奇偶错综，巧

譬善喻，变化百出，其贡献更在诗歌之上。

韩愈所说的“文”，是与“俗下文字”对立的“古文”。所谓“俗下文字”，就是骈文；所谓“古文”，就是以《孟子》、《史记》等为代表的散文。汉魏六朝以来的骈文脱离了先秦两汉散文的优良传统，讲究对偶、声律和典故、词藻，用古事古语比拟今事今语，日益成为抒发情思、反映现实的桎梏。隋及初唐，虽不断有人提倡改革文风，但收效甚微。唐自玄宗天宝（742—756）开始，政治日趋腐败，“安史之乱”后走向衰败分裂，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纷争，危机四伏。为了挽救危局，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从“文以明道”的角度反对骈文，提倡古文。到了韩愈、柳宗元，更大力倡导古文运动，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做出了突出成绩。影响所及，白居易善写明晰晓畅的古文，樊宗师能写奇奥生新的古文，刘禹锡也是古文高手；韩愈的门人李翱、皇甫湜、沈亚之等，皆得韩愈之传，或精于理，或练于辞。这样，唐代古文便达到全盛阶段。宋代及其以后的古文家，没有不学习韩愈的。韩愈是司马迁以后最大的散文家，对我国散文的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

韩愈论文学创作，既重视“师古”，即继承文学遗产；又强调“变古”，即发挥作者的艺术独创性。“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惟古于词必已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等，都是这方面的名言。他在强调文学修养的同时更强调道德品质方面的修养，提出了著名的“养气”论：“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善养“浩然之气”，则“气盛”；“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他深刻地认识到：“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

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答尉迟生书》）。他还中肯地指出：创作必须有感而发，不能无病呻吟。“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则鸣”说（《送孟东野序》）。韩愈的散文创作之所以取得优异实绩，是跟他对文学创作的深刻理解和充分实践分不开的。

韩愈的散文众体咸备，风格多样，几乎每一篇都有不同于其他各篇的独创性，故不能一概而论。就其突出特点而言：一是气盛，如《原道》、《论佛骨表》、《祭鳄鱼文》等，真可谓“如长江大河，浑灏流转，鱼鼉蛟龙，万怪惶惑”（苏洵《上欧阳内翰书》）。二是善于说理、叙事、抒情，而又力求化抽象为具体，形象鲜明生动。如《原毁》是论说文，而“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等句，形象极鲜明。《祭十二郎文》是著名的抒情文，而十二郎与相关人物都形象突出，栩栩欲活。至于叙事文如《张中丞传后叙》及许多墓志，都着力刻画人物性格，展现人物形象，更是显而易见的。三是巧喻善譬，其例甚多，不胜枚举。四是求奇恶熟，幽默恢诡，标新立异，不蹈故常。如《送穷文》、《毛颖传》、《进学解》、《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等，不一而足。五是千变万化，波澜迭起，而格局严整，脉络分明。六是善于锤字炼句，骈散并用，而以散御骈，气机流畅。韩愈是锤炼祖国语言的大师，其语言的简练、精粹、新颖，唐宋散文家鲜有其匹。他的散文中的许多语句，被后人用作成语，至今还活在人们的口头上。仅就《进学解》而言，至今被人们运用的，就有如下各句：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爬罗剔抉，刮垢磨光。

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或压缩为“提要钩玄”）。

贪多务得，细大不捐。
 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被压缩为“焚膏继晷”，“兀兀穷年”）。

补苴罅漏，张皇幽眇。
 挽狂澜于既倒。

含英咀华。
 佶屈聱牙。

闾其中而肆其外（或压缩为“闾中肆外”）。
 跋前疐后，动辄得咎。

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被压缩为“啼饥号寒”）。
 投闲置散。

校短量长。
 同工异曲。

俱收并蓄。

当然，韩愈的个别作品也有一些古奥生僻、佶屈聱牙的字句，但就总体而言，在当时是一种文从字顺、流畅生动的新型散文。

这本集子根据马其昶的《韩昌黎文集校注》，并参照古今多种选本，其选韩文约六十篇，绝大部分均按写作年月依次编排，写作年月不明的少数几篇，则编于适当位置。注释力求简明扼要，帮助读者理解原文。题解较详，除介绍写作时间、背景及有关情况而外，还作了一些艺术分析，侧重于探究本文的艺术独创性。破例选了两篇赋，一是由于对理解作者特定时期的遭遇、心态很重要，二是鉴于当前散文的创作应多式多样，从多方面吸取营养，推陈出新。杨朔写过一篇《茶花赋》，颇受好评，便可以说明许多问题。

（“文粹要略”改编） 1996年炎夏写于唐音阁

目 录

总序	王运熙
前言	霍松林
应科目时与人书	1
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5
祭田横墓文	10
答崔立之书	13
画记	19
太学生何蕃传	24
与孟东野书	30
圻者王承福传	33
送李愿归盘谷序	39
与于襄阳书	43
答李翊书	47
与汝州卢郎中论荐侯喜状	53
欧阳生哀辞	59
师说	65
与崔群书	69
送孟东野序	74
祭十二郎文	81
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	89
子产不毁乡校颂	92

原道	95
原毁	105
读《荀子》	109
读《墨子》	113
杂说（四篇之四）	117
送王秀才序	120
送王含秀才序	123
送区册序	127
五箴并序	130
毛颖传	135
张中丞传后叙	142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149
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	153
讳辩	158
送石处士序	163
送穷文	169
进学解	175
答刘正夫书	184
答尉迟生书	188
贞曜先生墓志铭	191
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	197
蓝田县丞厅壁记	204
唐故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	209
送高闲上人序	214
送廖道士序	219
祭河南张员外文	223
论佛骨表	230
祭鳄鱼文	237

柳子厚墓志铭·····	241
柳州罗池庙碑·····	248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254
送杨少尹序·····	260
顺宗实录（节选）·····	266
感二鸟赋并序·····	276
复志赋并序·····	280